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八五

經典的重建：

# 清初戲曲評點研究

高禎臨◎著

# 經典的重建

——清初戲曲評點研究

文史哲大系  
高禎臨著 285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經典的重建：清初戲曲評點研究 / 高禎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15.01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285)  
ISBN 978-986-339-022-0(平裝)

1. 清代戲曲 2. 戲曲評論

820.9407

103026703

文 史 哲 大 系 285

經典的重建  
——清初戲曲評點研究

著作者：高 禎 臨

發行者：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62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328 頁

初版：2015 年 1 月一刷 新台幣 380 元

ISBN 978-986-339-022-0

# 目 錄

第一章 導 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16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	26
第二章 金批《西廂》的經典重建過程 .....	39
第一節 閱讀行為的重新定義 .....	42
一、對話古今的文本語境 .....	42
二、示範閱讀的評點意義 .....	49
三、文本留白與讀者審美再創 .....	55
第二節 文學批評與經典重建 .....	62
一、以「才子書」重新定義文學經典 .....	62
二、才子書的內涵—「材」與「裁」 .....	72
三、「作者中心」與「讀者中心」的消解 .....	76
四、金聖歎的淫書之辨 .....	80
第三節 「金」針隨度—金批《西廂》的閱讀操作 .....	89
第四節 小結—經典標準的解構與重建 .....	108
第三章 才子的競爭—毛聲山《第七才子書琵琶記》 .....	114
第一節 毛聲山的讀者意識與批評立場 .....	119
一、知音讀者的自我期許 .....	119
二、《第七才子書》對於《第六才子書》的依附與背離 .....	124
三、藝術價值與教化意義並置的文本定位 .....	129
四、評點閱讀行為中的「理想讀者」 .....	133

五、讀者身份之界定與讀法的揭示.....	139
第二節 毛氏評點的互文性批評寫作 .....	144
一、毛批與前賢評語的差別異同.....	144
二、主要的互文性文本—《西廂記》 .....	152
三、答覆與辯論—問答式文體的批評意義 .....	161
第三節 小結—超越文本的理想讀者 .....	167
<b>第四章 跨越時空的文本對話—三婦評點《牡丹亭》 .....</b>	<b>173</b>
第一節 文本意義的兩個側面—婦女的戲曲「閱讀」與 「批評」 .....	177
一、明清婦女的閱讀與書寫 .....	177
二、三婦的閱讀動機與對話關係.....	185
第二節 文本間的對話.....	194
一、「非必求合古人」—詩意浪漫的陳同評點 .....	194
二、以續評仿作為志的談則評點.....	207
三、對話關係的完成—錢宜的補充、修正與提問 .....	215
四、建構與辯護—共同閱讀經驗的完成 .....	221
第三節 小結—女性評點的讀者召喚意義 .....	230
<b>第五章 文本間的多重身份—孔尚任與《桃花扇》 .....</b>	<b>236</b>
第一節 結構設計的言外之意 .....	248
第二節 局外指點—評點文字的多重提示性 .....	261
一、評點文字對於文本結構的提示分析.....	264
二、「戲中之戲」的互文意義 .....	270
三、隱身老贊禮背後的作者意義.....	281
第三節 附加性書寫的存在意義 .....	286
一、作家的自我表述 .....	286
二、從讀者反應到審美召喚的序跋文字.....	292

---

第四節 小結—多重語境的閱讀意義 .....	297
第六章 結論—清初戲曲評點的經典重建意義 .....	301
參考書目 .....	309

# 第一章 導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所有的文學作品在字句落下紙面的那一刻，同時也揭示了閱讀與接受行為的即將發生。文本作者經常是在對於接受者有所預期的情況之下進行創作，或者藉由寫作以對話自身，也可能是以一種尋覓知音的期待心情出發；然而無論最終作品的流傳情況是如何的，在進行書寫的當下，所謂的「讀者」早已存在於作者心裡，在文本中作為一種預設的對話對象。這尚未真實出現的「讀者」，並不單是作家對於作品可能的接受者在身份與能力上的有所界定，同時也包括著文本如何有效傳述表達旨意、以及引發閱讀趣味的書寫策略之思考安排。

也因此創作、書寫是孤獨的，卻又可以是不寂寞的；那些尚未真正出現的預設讀者經常成為作家寫作時一種心靈上的想像與照應。在對於接受者有所關照的情況下，作者同時也扮演起作品的第一位讀者，書寫過程當中，其立場與視野自然也是在「作者」與「讀者」之間來回地移走與轉換。作家對於文本審美效果的相關預設與期待，在創作時被轉化成一種所謂的「隱含讀者」的文本結構意義；待至「閱讀行為」真正發生的那一刻，「隱含讀者」於是從一種「文本結構中之讀者」的靜態意義，轉換成以實際經驗存在著的「完成閱讀行為之讀者」的能動身份，接受著預設於文本結構中的召喚功能，一場屬於文本與讀者之間的對話交流活動遂此展開。<sup>1</sup>

<sup>1</sup> 「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這一文學概念主要由伊澤爾

然而在作品完成之後，作者未能來得及清楚凝視日後如何觀看著作品的每一雙眼睛，其無可驗證原初預期的閱讀效果是否能完整發揮；因此文本到後來勢必以一種獨立的姿態，載負著作家的意志、靈感與情思，並在獲得閱讀接受的過程中，透過文字與所有讀者開展對話。但「作者」的意義早已融於作品之中，亦成為文本結構的一部份，藉由文字代其作一表述與發聲。

一旦文學作品以書籍、手稿或是印本的方式展示出來，便象徵著文本意義正式從作者個人擁有的狀態脫離出來，進入到讀者手中。<sup>2</sup>串連文本與讀者的，則是所謂的閱讀行為。閱讀過程中，帶著特定認知經驗的讀者一方面接受著文本的有意召喚，跟隨作品中的訊息指引持續前進，在一次又一次的閱讀行為裡，行走文本之際亦深化了自身的美感經驗，並將個人情意落實在對於文本的詮釋當中。文學語言本身的多義性以及字詞語句間遺留的細縫與空缺，自也給了讀者一種詮釋與想像的空間；這個實現文本意義的動作，既有審美接受功能，亦延伸出一種再行創作的意義。

是而「文本—讀者」成為閱讀行為與所有藝術活動中，最重要

(Wolfgang Iser) 所提出；伊澤爾認為「隱含讀者」一語包含「文本的」和「經驗的」兩方面的意義，前者指「一種召喚反應的結構，促使讀者能掌握理解文本」；「經驗上」的意義則強調「反應」的可能必須藉由讀者具體的閱讀行為方能加以實現。參見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4), p.xii. 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8), p.34。伊澤爾 (Wolfgang Iser) 著，霍桂桓、李寶彥譯：《審美過程研究—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45-51。

<sup>2</sup> 周紹明 (Joseph P. McDermott) 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03。

的兩端；在此互動過程裡，既已存在的文字或符號透過接受者加以理解、想像，進而轉化成有意義的形象、事件或情感，文學的審美效果於是得以發生。因此，藝術唯有獲得「接受、理解或詮釋」才能真正的實現，並經由這樣的行為印證了文本的存在意義。如同西方接受美學理論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言，文本像是一部管弦樂譜，在不同時代與讀者的演奏下獲得反響，開展出新的生命與時代意義；<sup>3</sup>文本的流傳與接受，亦有如一趟沒有終點的旅程，在作品問世之後行走各個時空、與不同的接受者進行交流的同時，屬於文本自身的豐富意義也因此不斷獲得開掘。

「閱讀」原屬於一種極其私密的個人行為，為文本結構所召喚引動各式情思於腦海中流轉，這是讀者藉由閱讀行為對話文本與自我之後可能的發生；在這段時間進程裡，種種思考感受存在於「我」與「閱讀過程／閱讀完成之後的我」之間，無聲的交流確保著這場對話的隱密性，外人無從得以窺探。

然而閱讀行為卻又可能召喚著讀者進一步的討論、書寫與創作欲望，原本無聲與無形的思緒交流活動，在讀者選擇透過文字記錄這個閱讀過程之後，又再度脫離了此刻作為書寫主體的讀者；這些批評文字亦可能引起再次的閱讀與對話，是而接續著的接受行為與新的讀者意義也將不斷延續發生。透過文字書寫記載下來的閱讀過程，讓閱讀行為原本的私密意義也因此具備了一種公開性；而這一個介乎「閱讀接受」與「審美再創」的文字書寫行為，除了印證了閱讀行為的動態意義，並再度說明了文學活動裡的每一個存在始終

<sup>3</sup> 參見 Hans Robert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 by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p.3-45。中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參見張廷琛編：《接受理論》（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1-43。

都是在「讀者」與「作者」兩種身份位置上巧妙移轉著。

回到古典文學的脈絡裡思考讀者身份與閱讀行為的意義，其中一個與此密切相關的文本形式正是「文學評點」。「評點」是傳統文學批評中值得關注的一種批評形式，其濫觴可往前追溯至漢代對於典籍的點勘注釋，當時對於經典的重視促成了釋義之舉，經學家透過對於文章的勘正闡釋，期能獲得對於經義的充分理解。經注其實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鑑賞目的，其對於後代文學評點的影響主要在於書寫體例之上；附注於經的書寫形式，所考慮到的正是讀者閱讀與理解文義的方便性。形式上的優勢自然也是評點文字之所以從經注功能一直延伸到關於文學鑑賞的理由之一，並也因此奠定了後代評點「注文與正文融為一體」的一個基本形貌。

唐代開始便出現了以文學作品為對象的評點之作；然將評點作為一種批評方法並普遍運用於文學作品之上，同時具備了成熟形式與內涵之評點作品則始自南宋。<sup>4</sup>此時的文學評點經常用意於指點初學者進行詩文的鑑賞與創作，遂也因此產生出通俗與實用的趨向；內容上則多傾向讀書心得與寫作技巧的筆記、分析與指導，讀者欲用以提升個人的文學修養與寫作能力，評論者則多半以窮究品評對象的藝術章法為目的。但這樣的評論形式卻也為文學批評開闢了一條新道路，並引起讀者與批評者的共同注目。<sup>5</sup>從長期的批評

<sup>4</sup> 古代文學評點相關研究可參見朱世英等著：《中國散文學通論》（合肥：新華書店，1995年），頁907-1003。吳承學：〈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與南宋的詩文評點〉，《文學評論》第一期（1995年），頁24-33。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三章〈評點學的淵源〉。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祝尚書：〈南宋古文評點緣起發覆—兼論古文評點的文章學意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2005年），頁74-82。

傳統來看，當「評點」的對象與目的轉向文學作品的分析鑑賞，其所具備的文學批評意義便逐漸被確定了下來；讀者／批評家得以藉評點發抒個人審美意見，評點除了可以是個人閱讀的心得筆記，這些文字也足以進一步擔負起一種指導閱讀的作用，引領著讀者對於文本進行「批評式的閱讀」。

文學評點最大的特點在於評詞與原文的並行存在，所有的評點都是對應著特定作品而出現的，因此評點初步的書寫意義與文學價值，是依附著文本一起發生的。<sup>5</sup>閱讀過程裡，評點者一方面藉著批評對象的形式與內容開展特定的閱讀方向與交流模式，並確定了審美活動行進的路徑，卻同時在有效的範圍裡實現了自身的閱讀能力與詮釋空間。這一個閱讀審美的接受行為雖非第一度的文學創作，卻同時兼具了批評書寫的再創功能，讓「接受」與「創作」一起建構起文本內涵的豐富意義。因而這些評點文字雖是作為一種對應文本而存在的批評文字，卻不再是純粹的文本接受反應，評點者所欲訴說的話語中帶有濃厚的個人特色，甚至是超越文本而流溢出來的主觀情思。

若將評點文本視作一個開展「閱讀行為」的「時空場」，評點文字幾乎是與文本脈絡一同前進。評點內容往往兼有感性主觀情動

<sup>5</sup> 吳承學認為宋代文學批評發達、宋人讀書認真以及宋代書籍大量普及是文學評點興起於此時的主要原因，但亦認為，文學評點與科舉有難解之緣，讀書人的需求促成了當時評點的興盛，也令當時評點之作有了濃厚的功利目的與實用色彩。孫琴安亦提出評點文學的發展與「講學」及「教育」是大有關係的。（頁 56）祝尚書則以為古代科舉考試的現實需要，促成了指導性的評點文本之盛行。

<sup>6</sup> 參見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1-2。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頁 6。朱世英《中國散文學通論》則將評點的定義細分為廣義狹義兩種，但亦認為嚴格意義下的「評點」專指「批點結合的形式，離開作品的評論不包括在內。」（頁 908）。

與理性客觀評論，既有作為一位專業讀者的審美批評取向，亦展示出閱讀過程中心隨文走的審美趣味；評點的讀者便是將「評點者」與「文本」之間的對話歷程一併接受，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對話關係，這也正是評點與一般文論之間最大的殊異之處。

就表現形式而言，我們容易將「評點文本」視為一種單純、靜態的文字作品；然其更應被視為是一個動態的文學活動紀錄。其所串連著的文學意義，同時包括獲得理解詮釋的文學作品、閱讀審美之實現過程、透過文字呈現的批評再創行為；以及隱藏於評點文本中的另一層召喚結構，並促成在批評完成之後評點文本的再接受活動。文學原所具備的詮釋空間，賦予了閱讀者一定程度的理解與想像自由，決定了文本的讀解勢必有所差異，使得詮釋本身將充滿個人的獨特色彩。評點者正是將自身的閱讀意見與文學作品，透過一種文字並列的方式出現在讀者眼前，呈現了一個「審美與再創」的成果，將自身的文學觀點以及接受歷程充分表述；後續的評點讀者們，既在評點者的引領之下深入文本幽徑，屬於評點者的主體特性在此閱讀過程中也一併為讀者所關照著。因此，評點之於受評文本是一種接受意見、印證著文本的存在，並又在依附著文本一起被接受的過程中，實現了屬於評點自身的文本意義。

唐宋以來累積了相當數量的文學評點之作，入明之後評點益盛，至晚明則進入了文學評點的創作高峰期。文學評點的盛行與明清的刊刻出版文化息息相關，明代中葉以降，印刷刊刻技術與書坊文化漸趨興盛，進一步促成了書籍的傳播與流通；<sup>7</sup>作為書本及知

<sup>7</sup>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以及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都曾提到，中晚明出版印刷業的發達與印刷成本的減低息息相關，紙、墨刻一類刻書原料貨源的充足使得成本下降，並且將手稿刊刻成書版的勞動力成本的減低，皆是促進這時期印刷刊刻書籍風氣興盛的重要條件。關

識主要擁有者的上層文人在原本的手抄形式之外，亦透過刊刻出版的方式讓個人的創作與文學評論意見得到更為廣泛的流傳。當書籍變成一種相對容易取得的文化商品，顛覆了文人獨佔書本知識的情況，也使得閱讀這件事隨之普及，不全然是社會上層菁英份子的專利；甚至包括婦女讀者群也隨著這一波大眾讀者一併興起，使得女性閱讀人口數量有了顯著的提昇。<sup>8</sup>

大眾讀者的閱讀興趣往往聚焦在較為輕鬆愉快的通俗文類，因此當他們透過商業行為取得書籍並成為消費者時，整個社會的書籍文化遂也出現的新的創作方向與傳播途徑，並使得小說戲曲這一類通俗文本擁有更有利的創作環境與流傳條件。此時的文人同樣無可抗拒通俗文本的閱讀趣味，也使得上層讀者與下層讀者之間的嚴格界線逐漸模糊；文人讀者進而在傳統詩文之外，亦將評點的觸角延伸到戲曲小說一類的通俗文學之上，並藉以對於通俗文學的價值重

---

於明代印刷出版事業的創建與發達，尚可參見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致忠：《歷代刻書考述》（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sup>8</sup> 十六、七世紀刊刻出版事業的興盛帶動著一個相對的「大眾讀者」的出現，這些人的身份例如地主、業主、士紳家庭及其家中女性等。然而這時期的大眾讀者其實是一種傳統菁英階層的延伸與擴展，社會上多數人依舊是文盲，亦不具備消費書籍的經濟能力。然而「大眾讀者」一詞則用以說明當時刊刻出版繁榮所帶動的書籍文化的蓬勃，並凸顯了讀者身份為少數菁英士大夫所壟斷的情形已經不存在了。這些新興讀者確也因為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消費群，影響了創作環境與出版市場；帶給當時整個社會在文化與智力上的衝擊，則是一種無法計數的力量。參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一章〈都市文化、坊刻與性別鬆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9-71。

新定義。<sup>9</sup>

這時期影響並決定著書籍刊刻出版的另一種特殊身份正是所謂的書坊主人，他們一方面以商業價值作為出版書籍時最主要的考量，同時亦敏感地知覺到評點文字依附文本而生時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評點文字對於初入文學世界的大眾讀者群有著引領閱讀的意義，萬曆年間陳邦俊《廣諧史·凡例》便如此說道：「時尚批點，以便初學觀覽，非大方體。」<sup>10</sup>這些善意而簡單的註釋、解說，甚至帶有分享意義的文字也同時具備一種促進銷售的功能，也因此深獲書坊主人所重視並加以運用。<sup>11</sup>

相對而言，文人投入小說戲曲的評點，享受著閱讀趣味的同時，讀者意識與閱讀主動性是較為清晰可見的，較之書坊評點則較能擺脫商業的考量。為文人所在意的，是藉由批評書寫、出版交流過程中所引起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與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交換與獲得。<sup>12</sup>也因此文人評點某種程度而言，方才是

<sup>9</sup> 參見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頁 11-13。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合肥：新華書店，2002 年），頁 11-18。

<sup>10</sup> 明·陳邦俊：《廣諧史·凡例》，收於《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六輯·諧謔篇》第十六（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

<sup>11</sup> 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中提到，從明代小說刊刻的角度來看，在書坊主人充當評點者角色時，小說評點更多地體現出廣告效應；直至文人群體大規模地介入到通俗小說的創作與傳播後，小說評點的文學批評意義才逐漸明確。頁 302-305。

<sup>12</sup> 法國理論家 Pierre Bourdieu 曾將社會上流動的價值區分成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象徵性資本四種；經濟資本所指正是實際的經濟獲得，社會資本則牽涉到人際網與社會脈絡的建立與開展。文化資本則是一種內化了的、無可用數字衡量的文化修養，象徵性資本則可解釋為一種頭銜或名聲。此處的「文化意義」與「象徵性意義」概念主要源自 Bourdieu 對於社會結構中資本的交換流動性所提出的名詞與分類；相對而言，書坊主或者將經濟上的獲得視為文本內容與出版形

真正承續實現著評點所具有的文學批評意義，與書坊評點以促進銷售為目的閱讀指引，兩者在書寫目的、批評策略與評點內涵自是不盡相同的；然不可忽略的是，彼此之間無可避免會有著相互滲透或功能重疊的情形。<sup>13</sup>小說、戲曲評點的大量問世，無疑說明了當時創作環境與閱讀市場對這一類通俗文學有著相當程度的需求；這股風潮興起於明代中葉並一直延續到清代中期，累積下為數可觀的小說戲曲評點作品。

從書籍文化的角度，關於閱讀行為的私密與公開相對關係又將獲得重新的理解；讀者可以藉由購買行為將書籍視為個人的擁有，進而實現自己的閱讀批評行為，而這些評點文字卻也可能因為書籍的借閱、轉賣、交換觀覽或有進而加以出版等方式，使得私人性的

---

式的最主要考慮，然文人作家在自願性的創作條件下，往往對於作品如何向社會說明他所擁有的文化蘊底，以及因此為其搏得正面的聲譽、評價（所謂的象徵性資本）作為最主要的期待。但可以延伸討論的是，文化資本與象徵性資本某種程度對於主體的社交活動將有積極的促成意義，這自然也同時是文人作家所樂見的。因此，清代「有自覺」的文人作家看待自身文本的創作與傳播，其實仍舊是將這一些互動性的交換意義設定在文人或是社會的上階層當中；知識文人階層往往將文化與象徵性的價值視為是比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東西，也是用以評價定位一個文人的最主要依據。Bourdieu 相關理論參見高宣揚：《布爾迪厄》（台北：生智文化，2002 年），頁 247-253。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出版社，2002 年），頁 120-121。

<sup>13</sup> 明代「文人」與「非文人」之間的界線有其模糊地帶，同時之間，所謂的上層知識份子可能屈就市場的需求參與商業性的出版與寫作，因此將「書坊主人之評點」與「文人評點」對立而論時，是為了便於說明當時的文學評點因為各種不同的創作目的而可能產生不同的書寫內容；事實上兩者之間確有其重疊之處。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頁 152。

閱讀筆記亦因此隨之流傳，反而造成了評點文字的「公開性」。<sup>14</sup>在刊刻出版盛行的文化條件之下，評點書寫的意義又顯得更為複雜；許多時候評點者在書寫的當下即已預期評點本加以付梓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看似私密的批評行為，其實是面對著一種具備開放條件的文學環境之下微妙地進行著。文學評點原本即設定一種「共討論」的批評意義，<sup>15</sup>但在以刊刻出版作為書寫目的之一的情況之下，勢必讓評點者對於「共討論」的對象與可能的讀者群有著更大的想像。正是因為這樣的文化條件決定著評點文本自身的曖昧性，評點者移走在「個人閱讀」與「對話讀者」的兩端，書寫品評心得之際同時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批評文字可能開展的被接受行為。介於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定位，使得評點文字在書寫過程中，既有著傾聽於原文本之後產生的理解與對話，藉由文字寫下詮釋與評論的同時，他同時也預設了特定的說話對象進行發聲。

刊刻出版事業的蓬勃同時帶動著「序跋文字」的書寫。文學作品或文集裡的序、跋文章有著漫長的書寫歷史，有自己作序或他人代為題序兩種不同方式；序跋文章在文學批評的意義之外，同時也具備著收集讀者響應以及推薦哄抬文本價值的目的。<sup>16</sup>清代文人更

<sup>14</sup> 楊玉成〈文學評點與印刷文化〉：「評點產生於印刷文化，讀者以私人筆跡寫下批語，公共與私密的複雜關係於焉展開。抄本時代的讀者雖然也有評點，但印刷時代卻將私人閱讀公開刊行；書商習慣上以印刷體刊行正文，批語則模仿手跡（楷書、行書、朱批）刊行，形成公共／私密並置的文本空間。」此為楊玉成老師於2010年4月19日於東海大學中文系演講文字稿，頁55。

<sup>15</sup> 清·張潮《虞初新志·凡例》：「觸目賞心，漫附數言于篇末；揮毫拍案，忽加贅語于幅餘。或評其事而忼慨激昂，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既自怡悅，願共討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1783冊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頁2b-3a，總頁171-172。

流行以序跋作為一種交往工具，一方面是一種閱讀意見與創作觀念的文字交流，擁有名氣的文人所寫的序跋，無疑對於文學作品本身是一種加分的作用；也因此造成這些清代文人在創作刻集時，習慣將友人所寫的序跋依附在自己的文本之上用以提高文本聲勢，並促進作品的傳播或影響文學評價。<sup>17</sup>是而序跋文章在這個時期，除了延續著原本所擁有的批評討論與文學交流功能之外，亦呼應時代風潮，有著強烈的傳播或行銷文學的意義。

也因此當我們在理解明清時代的文學評點時，已不能將其單純地視為一種文學批評傳統下的產物；特殊的創作出版條件與閱讀文化，對於評點者書寫的動機、批評的對象與方法皆有著深刻的影響。書坊主人或將評點作為一種銷售與廣告的文字工具，而上層文人卻可能進而將評點作為一種藉閱讀批評以發抒、傳遞個人文學意見的文字場域，甚或藉以建立自身在社會上的文學聲譽。對於具有文學期許的文人讀者們而言，藉由評點示範引導大眾讀者如何閱讀文本，自也是他們書寫批評的強烈動機之一。從「閱讀批評行為」來說，評點滿足著讀者藉批評以發聲的欲望，這是書寫批評意見的動力來源；在「評點讀者」這一端，藉由這些評點文字一方面得以「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sup>18</sup>原為評點作者的私人閱讀筆記竟

<sup>16</sup> 吳承學、劉湘蘭：〈序跋類文體〉，《古典文學知識》一期（2009年），頁103-110。

<sup>17</sup> 魏耕、錢價人《今詩粹·凡例》：「近見一稿之出，贈序必有十餘篇；一書之成，必問屬某為序。」參見謝正光、余汝豐編：《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6。李明睿《詩慰·序》亦云：「今人刻詩，往往序多於詩，何也？」（同前，頁79。）兩段文字皆充分說明清代刻書必佐以序跋的風潮之盛，但也見得蘊藏於序跋文字之下的社交權力關係。

<sup>18</sup> 李贅：〈忠義水滸全書發凡〉，收入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